

几个月后，我厘清了思绪，重新去找那个在北京长大的傻姑娘，一个月后我们开始交往，8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我一直觉得我挺像个挖金子的人，但这次我觉得我挖到的是一块玉。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婚姻对我来说依旧是正在学习的课堂，但我收获了一个学习伙伴、生活伴侣和最好的爱人，也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丈夫、一家之主。

走出来的新疆，走不出来的新疆人

从新疆走出来到内地，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很尊重我，都很友好。曾经相处了三四年的室友，来自青岛的技术宅男李一斌，我们相处得跟亲兄弟一样。然而，不理解、不包容的事情并没有消失。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再到后来的“切糕”事件，乃至现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媒体总是把“暴恐”的帽子扣在新疆这两个字上。个别恐怖分子的暴行，直接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新疆人。

我无论去哪儿，都要说我是和田人、新疆人，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们介绍和田，想尽办法多办新疆主题的摄影展，甚至一有拍摄任务就带大家去和田，为此还争取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的和田麻糖和沙漠烤肉的部分，连师爷陈晓卿都服了我，说一有好事儿我就推荐和田。但为什么和田人觉得我不好，觉得我家人不好，这让我很伤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有些事我也会和朋友们聊聊，大家都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说：“库尔班江，如果是我遭遇到这些不公，我肯定做不到你这样，还拿相机宣传大美大爱……”。我悲观过，极端过，还想过老子走人，但我更想给后代创造一个平等友爱的社会环境。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我想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父母，我做好我自己，为我自己做事，不为别的，剩下的留给世人评述。我要做的就是用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用影像记录，让图片诉说。

要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我的见识还是不够多，于是我去印度、土耳其、美国做背包客，去观察那些国家和社会最平实的一面。我看到了印度对宗教的虔诚，土耳其对信仰和文明的包容，美国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在这些国家，古文明得以保留，新文化更得到了发展。

我发现，最有力量的是人的形象和故事。于是，我开始策划拍摄和撰写《我从新疆来》。

选自《我从新疆来》的26篇自述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人物：阿依木·艾则孜（91岁，维吾尔族）、阿孜古丽·艾则孜母女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总是十分忙碌，经常要熬夜加班，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把发展和建设新疆，传承维吾尔族民族历史和文化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

我的母亲阿依木·艾则孜于1923年5月22日在塔城出生，18岁时和我的父亲结婚。母亲曾经在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自治区文化厅等单位工作过，父亲也一直在自治区政府部门工作。两个人在工作期间都为新疆的发展建设不遗

余力，特别是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贡献。那时，新疆少数民族的歌舞第一次走出国门，将中国多民族团结共存的友好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1953年，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自治区领导的夫人，和当时在任的很多位领导的夫人一起，在当时的马列主义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党校上学。那时我才两岁。父亲也非常忙，我基本上就是家里的亲戚和阿姨带大的。1978年我们全家随父亲一起来到了北京，母亲在北京担任民族文化宫的顾问，直到退休。

母亲对自己的工作非常上心，而且很努力，在家庭方面她也一点也没有松懈过。母亲生长在塔城，那里曾经深受苏联文化的影响。母亲给我看过那时的照片，即便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时期，每个人的穿着打扮都十分体面，很精神。我家在家居、服饰、饮食以及娱乐方面，不仅保持着传统的维吾尔族文化，也带着些许俄罗斯风情。母亲做得一手正宗的维吾尔族美食，也会不少俄罗斯民族的风味美食。母亲只要在家就一定亲自下厨，在家里帮忙的阿姨，手艺也基本上都是母亲教的。母亲在家总是抹布不离手，走到哪儿擦到哪儿，这让我也学会了持家的本领和技巧。

父母对我从来没有很严格的命令和要求，家里的氛围总是非常平等，他们教育的方式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母总是说，我们民族的孩子一定要多读书，多学习知识，才能成为对家庭、社会有用的文明人。我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一起探讨国内外局势，讨论他们近期看过的书，和我交流在写书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想法。母亲更是要求照料她的保姆每天给她读报纸，以此帮助她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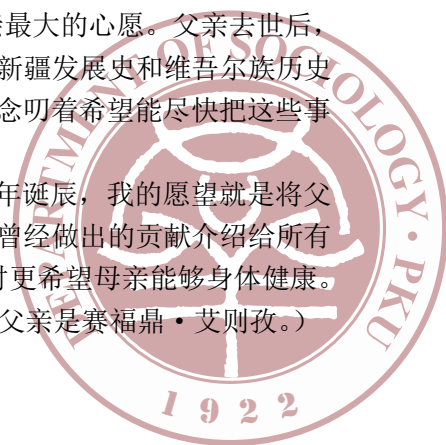
父母总是乐于助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待人接物的方式让我深受感染。他们经常帮助在农村的经济状况不好的亲戚，有亲戚的孩子来北京上学，就会邀请他们每周末来家里吃饭。父母非常喜欢孩子，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但他们还在新疆各地领养了不少孤儿，将他们接到北京的家里一起生活，我父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我也因此拥有了不少兄弟姐妹。

初到北京，那时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并不多，大部分是从新疆毕业后被录取到北京的，或者是在北京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年轻人。父母想办法召集他们来家里，定期办聚会，和他们畅谈在京的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缓解思乡之情，让他们在异乡也能得到归属感。这些维吾尔族年轻人留京后，大多在这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并结婚成家。母亲了解到，这些年轻人中的女性很小就远走他乡求学，还没有和自己的母亲学会持家，有的甚至都不会做饭。母亲便经常召集她们来家里，手把手教她们做传统的维吾尔族美食，教她们作为女性应有的谈吐和穿着，以及作为妻子在家庭中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有时在聚会的时候还会教她们跳舞，把自己年轻时学的维吾尔族交谊舞教给这些年轻人。

我的父母用这样的方式，感染了一批在京的维吾尔族年轻人，也感染了我。我不仅在这些活动中学到了很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因此结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的父母十分重视和热爱自己的民族。父亲总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比伊斯兰教的历史还要长，因此他在保护民族历史文献资料 and 传统民族文化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还撰写、整理了大量文字内容。我从1990年开始做父亲的秘书，记录和保留了父亲的所有资料和手稿。父亲2003年去世了，留下了将这些资料和手稿集结成册的遗愿，而这也成了母亲最大的心愿。父亲去世后，我和母亲就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散文集、回忆录，以及父亲写的关于新疆发展史和维吾尔族历史的文字，并制作了文献纪录片。这两年母亲的身体不太好，却也总是念叨着希望能尽快把这些事情做完。我对母亲说，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我们才能做完这件事。

201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同时也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我的愿望就是将父亲的文献资料集结成册并出版，将新疆和维吾尔族的历史，以及父母曾经做出的贡献介绍给所有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让他们明白新疆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同时更希望母亲能够身体健康。（本文口述者为91岁的阿依木·艾则孜之女阿孜古丽·艾则孜，其父亲是赛福鼎·艾则孜。）



简约而不简单的骨科大夫

肖吾开提·热皮克，32岁，塔塔尔族

我性格开朗，7年外科医师的工作经历，造就了我做事雷厉风行、简约而不简单的工作作风。

我从新疆医科大学临床专业毕业，之后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骨科当住院医师。工作期间，我跟患者家属的沟通一直很不错，关系都很好。

2010年我跟太太结婚，她是个在北京长大的维吾尔族姑娘。第一年我俩分居两地，一有空就飞来飞去，为了能在一起生活，我争取到了去北京进修的机会。进修时我积极参与各种手术，一年后就进入中国武警总医院骨科当住院医师，一直工作到现在，今年1月还被评为2013年优秀医师。

很多从新疆来的患者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来北京看病都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基本都不认识。有的下了火车就给我打电话问该去哪儿，有时候休息日我也得出门帮这些患者找医院。他们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在北京像我这样会维吾尔语的医生没几个，帮忙也是应该的。

虽然离开了乌鲁木齐那个热闹而亲切的城市，离开了家人和朋友，但和太太一起生活是我来北京最大的动力。我在乌鲁木齐也曾经组过乐队，现在周末我就在后海跟北京乐队的朋友们一起切磋，这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也是我融入北京的一种方式。今年6月我和太太将迎来我们的宝宝，希望太太可以顺利生产，宝宝平安健康地出生。（截至本书出版，主人公和太太已经平安迎来了他们的女儿，取名赛菲娅。）



我不是“黑肚子”，我是玉石文化使者

亚库普江·阿布都塞买提，27岁，维吾尔族



我一直记得我爸跟我说的一句话：不要着急赚钱，先把人做好。我在深圳经营家里的玉石店，老婆和3岁的儿子也在身边。我在新疆职业大学念的书，学的是英语，曾经梦想做个导游，从来没想过会做玉石生意，虽然我爸是做了30多年玉石生意的商人。

毕业那年夏天我陪爸爸去东莞做生意，那边清真餐厅非常少，吃饭要去很远的地方。我爸出去买饭，我就在宾馆看管石头。我记得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我从窗口看到我爸买饭回来，他微驼着背在雨里慢慢地走，看到这个场景我忍不住哭了，觉得爸爸这么多年在内地做生意，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也因为这件事，我放弃了导游梦，跟着爸爸学做玉石生意。

爸爸的原则就是不能骗人，要跟识玉的人做生意。不识玉的可以跟他讲，让他懂，但实在不懂的人，不能让他店里消费。因为玉石生意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黄金有价，玉石无价”，不能让人产生任何疑惑。跟我爸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头儿脾气大，有原则。



记得有一块 4 公斤多的石头，花 160 万买的，没多久深圳一个老板想要，开价 560 万。我爸当时已经基本不怎么管生意了，我也就没跟他说。第二天就要交易了，我爸知道了，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他欣赏一下。他眼睛很毒，只看了一眼，就说这个石头不能卖。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个皮子（指皮壳，即玉石的外皮）不对。我说不可能。他便证明给我看。爸爸端了一盆开水，把石头泡在水里一个多小时，然后放到冰箱冷冻室里，第二天拿出来，我闻到了浓浓的化学品味。我当时急着挣钱，说这也没褪色，还是给他吧，能赚 400 万呢。我爸立刻严厉地说：“你来这边是赚钱的还是扎根的？”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刚开店的时候，经济上的压力挺大的，开始那两年性子急，现在快 5 年了，我已经完全沉淀下来了，这也是因为我爸经常来深圳监督我。

我爸还有一个原则：自己店里的东西，要自己指出它的缺点。我一开始接受不了——不夸就不错了，为什么还得指出缺点？我爸说，这样说是为了让别人心服口服地买。否则，买家拿走石头再给另外一个人看，别人如果看到这个缺点，我们在买家眼里就成了骗子。经过这么几年的时间，我慢慢明白了这个道理，也慢慢地像我爸说的那样，在深圳扎根了。

现在我是深圳人了，身份证都是深圳的，护照虽然办得很波折，但总是有了。今后我很想去别的国家看看他们的文化，也和他们交流交流，给他们讲讲我们和田玉的故事。我想说：我不是石头贩子，我是玉石商人；我不是“黑肚子（方言，指没文化）”，我是一个曾在校园里奋斗过的大学生。我来自新疆玉石之乡和田，我想做一个玉石文化的使者。

最爱的还是那故乡

秦玉东，38 岁，汉族、哈萨克族混血

我现在在陕西科技大学 MBA 教育学院做老师，我教的课是政治，少数民族区域制度也是其中一部分内容。每次讲到这部分时，我都会结合我自己的经历给学生说说新疆，因为那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我父亲在甘肃平凉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是家里的老八。从 1959 年开始收成不好，父亲家因为要养活 8 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为了活下去，当时 9 岁的父亲就跟着几个小伙伴一起辗转来到新疆，到阿勒泰一个国营的牧场当起了放牛娃。当时草原上懂汉语的人很少，受过教育的就更少了，上过几年小学的父亲成了“知识分子”。17 岁时，父亲在牧场干部的建议下开始学医，成了“马背赤脚医生”。之后的很多年他都背着药箱，走遍了阿勒泰的大草原，历经严寒酷暑，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给游牧的哈萨克族牧民行医抓药。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人都很喜欢父亲，给他取了个哈萨克族名字，叫“秦肯”，从那之后，我父亲就成了哈萨克族人的儿子。

父亲在开始行医的那一年认识了我母亲。母亲出生在哈萨克那伊曼部落的一个游牧家庭，家族在当地小有名气，家教非常严格。母亲温柔善良、勤劳聪慧，爱慕她的人也不少。后来听母亲说，她那时在河边挑水，父亲骑马行医路过时执意要帮她，两人一见钟情。那个年代异族通婚很少，母亲家里也很反对，但 1971 年他们还是结了婚。从那时起，母亲就陪着父亲一起行走在草原上，为游牧民治病。直到我大姐阿依古丽出生，他们才在牧场的场部定居下来。之后又有了我二姐阿依努尔和我。父母走到一起很不容易，但是非常幸福。

父亲在开始行医的那一年认识了我母亲。母亲出生在哈萨克那伊曼部落的一个游牧家庭，家族在当地小有名气，家教非常严格。母亲温柔善良、勤劳聪慧，爱慕她的人也不少。后来听母亲说，她那时在河边挑水，父亲骑马行医路过时执意要帮她，两人一见钟情。那个年代异族通婚很少，母亲家里也很反对，但 1971 年他们还是结了婚。从那时起，母亲就陪着父亲一起行走在草原上，为游牧民治病。直到我大姐阿依古丽出生，他们才在牧场的场部定居下来。之后又有了我二姐阿依努尔和我。父母走到一起很不容易，但是非常幸福。



父亲给我取名为秦玉东，母亲给我取名为“巴合提”，意思是“幸福”。我们哈萨克族非常重视家庭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也非常好，没跟父母吵过架、顶过嘴。父亲对几个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十分苛刻，特别是在读书这件事上。当然，他们的辛勤付出也有了回报——两个姐姐都上了中专，大姐后来继续读了大专，我也考上了内地的大学。

1997年9月，我生平第一次离开阿勒泰大草原，来到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心情紧张而亢奋。第一次上红山，第一次坐电梯，第一次吃康师傅方便面，第一次喝可口可乐，又第一次坐火车出了新疆，来到西安。记得第一次看见火车停在我面前，我还急着问别人火车来了没有。当时乌鲁木齐到西安要60个小时，我坐在硬座上，激动得没合过眼。

到了那所影响了我一生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辅导员和学长对我都特别好，帮我拿行李、报名，告诉我清真餐厅的位置，还把我领到宿舍，见到了其他7个小伙伴。之后的4年我们都成了“生死之交”。我看见绿绿的校园、数不清的楼房、穿梭的大巴车……那些日子就像在做梦。

毕业后，为了女友，我坚持留在西安找工作，虽然她觉得我们的未来没有什么希望。我找了一份在西安国营通信公司做技术员的工作，待遇还不错，只是经常要到全国各地出差。生活很不习惯，特别是饮食不适应，所以跑了两年，攒了点儿钱就辞职了，开始做点儿小生意。但小生意也不顺利，钱很快就花光了，女友最后还是没有和我走在一起。我毫无目的地流浪了一段时间，慢慢厌倦了。夜深人静，我就开始思念家乡和家人，想回新疆。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回去，起码要混得像样子才行，那叫衣锦还乡，回报家乡，像这样灰头土脸地回去，不行！我选择继续留下，寄宿在同学家，开始复习考研。

运气还不错，我考上了硕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我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一份教师工作，后来又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她很简单、淳朴、直率，我们就结婚了。

2007年8月我父亲去世，母亲悲痛欲绝，也觉得孤单。我们劝母亲卖掉了新疆的房子，来西安与我们一起生活。50岁的母亲从来没离开过阿勒泰，没离开过草原，刚开始到西安特别不习惯，我们也陪她克服了很多困难，她现在能慢慢适应这个地方了。我们的儿子纳菲尔和女儿哈尼娅也相继出生了，现在一家人的生活简单、平凡，也很幸福。

新疆，特别是阿勒泰，对于我来说永远是最爱的地方，那是我的故乡。我在新疆的发小各个民族的都有，到现在感情都很深，等老了有福气的话，我还是想回到家乡。现在每天清晨，母亲会早早起床做早餐，做一壶奶茶给自己和我，做一碗稀饭给我老婆。两碗奶茶，一碗稀饭，两盘干果，一些甜点，我们一家子一起吃早餐，一起看着两个孩子的笑脸，就这么享受着平凡家庭的快乐。2014年是我该评副教授的年份，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压力挺大，工作也挺忙，家里有母亲和老婆照顾，我也很踏实，很欣慰。希望我的家人身体都好，希望一切都好。

为了生存和孩子的教育



托合提汗·麦麦提，42岁，维吾尔族

我和丈夫15年前下岗，都是工人，除了之前的工作，没有别的生存能力。于是，我丈夫就和一个老乡去了郑州，他在那边学会了打馕。后来他去了北京，觉得在北京馕很好卖，就叫我也来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出新疆，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北京，但在北京除了牛街，我也没怎么去别的地方看过。就这样，一晃15年过去了。

我和丈夫在牛街摆摊卖馕。我们三个

孩子，两个在新疆，一个在北京。当初来北京本来是希望能让三个孩子都在北京接受教育，但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孩子在这边入学也挺难，这让我们很无奈。

我们老家在阿克苏农村，每次给家里打电话，孩子都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大儿子说他的同学都嘲笑他说：“你的父母是‘库里奇’（异教徒），肯定不干什么好事儿！”有的老师还会责问我儿子：“为什么你们的父母不回来？”但我们回去真的没有办法生存，而且我们在这儿坚持了这么久，也是为了孩子能接受好的教育。

我们在北京租了个 40 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好几年了，房东对我们特别好。以前会有警察来查访我们，但昆明事件之后，派出所就真的要我们搬走。我特别害怕，给房东打了电话，他真的对我们非常照顾，跟我说让警察直接去找他，让我们踏实住。

我们俩都是老实人，就是想挣点儿钱。牛街这边穆斯林多，平时也有新疆老乡来这边，他们迷路的时候，我丈夫还会给他们带路，帮忙联系。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孩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社会有用的人。

侠气纵横的女律师

乃菲莎·尼合买提，35 岁，维吾尔族

我初中时读过一本关于一个女律师的小说，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那时起我就梦想在中国最璀璨的城市当一名侠气纵横的女律师。我毕业后留在上海，一无所有，然后在合适的年龄吃苦耐劳，在合适的时机寻求稳定，在合适的机遇下结婚生子，这是我梦想实现的过程。不论我怎么偏离航道，最终还是做了我最喜欢的工作，拥有了律师执照，加入了全亚洲最好的律师事务所。中间当然有很多波折，但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所有经历我觉得都是宝贵的记忆，值得回忆的人生就是财富。



我在上海的金杜律所工作，这是一家公认的精英云集的律所。我一直觉得自己能进这里工作，运气成分超过实力。那年冬天，我和其他 11 名学生从几百个候选人中被录取到这家律所实习，最终拿到 offer（录用通知书）的包括我在内只有 4 个人。当时我觉得不少离开的人都比我优秀得多，而他们被拒绝的理由是“与本所文化不相融”。这些年看着身边的同事有人升职，有人降职，有人生子，有人离婚，有人春风得意，有人抑郁无常，我做不到像他们那样把所有的生命奉献给工作，我不敢想象一些大腕儿律师以“累死在电脑前”为荣。我现在是主办律师，中等层次，已经很满足了。这世界很公平，付出多少就能得到多少。相比于其他同事，我是不够努力的，天性懒散，又喜交友，我可能只用了 50% 的精力来工作。我的家庭对我来说最为重要，我的朋友、学业则是人生中的绿叶和花朵。

“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我抱着我刚出生的小宝宝，我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曾经梦想成为律师的热情和单纯，以及如孩子一般的梦想和初衷，我想去读书。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律所的管理层时，他们说：去吧，一切为你保留，随时欢迎你回家。这是一种归属感，强烈的认同感和同伴感。我丈夫总是无条件地支持和包容我的一切，他考上了在职博士，让我深深地羡慕，也有了非常大的动力。我父母也支持我读书，让我把孩子交给他们



带。我唯一舍不下的就是孩子，他才一岁半，正是最缠我的年龄。我送他回了乌鲁木齐，陪了他5天，我每天都指着天空跟他说：

“宝宝，妈妈要坐飞机，呼——飞到美国去，妈妈只读8个月的书就回来，你等妈妈，好不好？妈妈会呼——飞回来找你，你要听话，不能哭，好吗？”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依依不舍。5天后，我哄他睡午觉，和他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趁他睡着时走了。母亲说他醒来以后，到处看了看，发现我不在，说：“妈妈，呼——飞——”母亲说他从没哭闹过，只是每次都会指指天空说：“妈妈，呼——”来美国后，我们经常通过视频见面，第一次小家伙满眼的泪水，没哭出来。关了视频后我哭了，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离开他这么久了。

今年我开始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我现在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保护少数民族女性的权利。

大漠驼铃里的石油工程师

艾合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36岁，维吾尔族



掰掰指头算一下，我离开家乡都15年了。离开阿克苏到大学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按理说那天应该很兴奋，但我从辅导员的表格中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居然是倒数第三，心里落差非常大。军训之后的分班考试又是一次打击，突然觉得自己在老家数一数二的成绩就是个笑话。大学四年，“外语村”的小教室、系里的自习室，还有图书馆都成了我除了宿舍之外的窝。就这样，天道酬勤，我毕业时以年级前五的成绩被保送到了中国石油大学读研。

研究生第一年是我求学生涯中比较充实的一段时间。每天除了跟导师做项目，泡图书馆，我还拿了研究生奖学金、全校英语演讲第一、青岛市六大高校英语演讲第三。那年我决定读博士，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没成体系，还没挖掘出自己的专长，而我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这就必须继续深造。我选了我感兴趣的科研方向，一研究就是十年，到现在我还在学习，关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德国留学，那段经历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德国式严谨”，这体现在他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连公交车都有精确到分钟的时刻表。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养成了做事不拖拉的行事风格，这帮助我出色地完成了答辩，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

回到北京，我在中石化研究院找到工作，实习期第一个月工资是2700块。我在单位后面的地下室租了间15平方米的大开间，房租每个月1300块。我爱人还在老家的学校当老师，我刚上班的那会儿，她来北京过暑假，我们就一起琢磨如何节约开支：下班之后先遛弯儿，等卖菜的快收摊了再去买，便宜嘛！当时生活确实比较艰苦，北京的夏天闷热得要命，看着爱人跟我一起受苦，我也特别心疼。没过多久我就转正了，之后的日子就好多了，最起码不用为了洗澡每天排队。

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我就琢磨着怎么把我的小家庭接来北京。上班每天到饭点儿我就头疼，吃什么？离单位不远就是高校区，那里有很多新疆籍学生和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留学生。我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苦恼吃不上家乡菜，现在的学生应该也很愁吃饭的事情吧。要不，开一家新疆餐厅？爱人寒暑假过来，也能帮我打理。一有这个念头，我马上跟朋友借钱，又从新疆请来了厨师，开了第一家店“大漠驼铃”。餐厅开张的事在周围高校的学生中传开了，来吃饭的不少，也有来申请做兼职的。我特别支持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不仅可以给他们家里减轻负担，还能锻炼一下他们待人接物的能力，增加社会阅历——前提是不耽误学习。店里每个月还会资助一两名贫困学

生，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这也都是因为我有在内地上学的经历，对这些学生有非常特殊的感情，所以无论在学习还是在生活上，我都希望能尽力帮助他们。

我平时工作也很忙，爱人也只有寒暑假才能来帮忙。餐厅经常不赔不赚，而且头疼的是厨师总留不住。对于一个餐厅来说，厨师的稳定性最重要。我从新疆带来的年轻厨师，他们保证了餐厅的饭菜有新疆的原汁原味，但对待工作并不认真，一个月的工资可能没两天就花光了，甚至不打招呼就跑了。我也挺为他们着急的，经常开导他们，但拦不住，这大抵还是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

今年我也 36 岁了，现在是北京的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海外 ADDAX 研究所副主任，事业稳定。这也意味着我很难有机会回家看父母和家人。年假很短，就算坐飞机，来回路上也要两天，回趟新疆真是来去匆匆。女儿在新疆，她出生时是早产，我还在赶写材料，宝贝“闪亮登场”的时候我也没在现场。爱人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当爸爸了”的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每次想到这些，我都非常难过和愧疚，特别想陪在父母身边好好尽孝道，也想对爱人和女儿多尽一些丈夫和父亲应尽的责任，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更加努力工作，保障家人的生活，并且祈求真主保佑家人健康快乐。我和爱人给女儿取名穆菲达（意思是“对社会有益的人”）。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希望她能以一颗感恩的心对待生活。

今年暑假我特别开心和幸福，虽然还是因为工作和餐厅忙得不可开交，但我爱人和女儿都来北京了，一家三口团圆了。这个幸福的暑假也让我想要更加努力，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行走西藏的蒙古族伉俪

巴依尔塔和巴音巴依尔塔，30 岁，蒙古族



我是牧民家的孩子，来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巴音那木山，也叫“空中草原”。我从小就在山水丛林里放牧，唱歌就是我最大的乐趣。

上学那些年，我对文学和音乐特别感兴趣，除了听歌和看小说就没别的爱好了。大学期间我又爱上了吉他，在乌鲁木齐组乐队演出，这跟我学的会计专业相去甚远。父亲对我很失望，他希望我有安稳的工作，亲戚当然也都非常反对，但我很坚持，因为喜欢。

毕业后我决定留在乌鲁木齐，和几个好兄弟一起租了房子，开始练琴、找演出什么的，也认识了圈儿里的几个哥哥。就这样，我们边学习边演出，还能挣点生活费。我们在当时还是一支比较有名气的蒙古族乐队。后来主唱去了内地，乐队也就解散了。没活儿干的时期很艰难，我靠饕和方便面过活。在乌鲁木齐的大冬天里，由于没钱搭车，走好几公里的事儿常有。兄弟们也慢慢坚持不住了，他们开始觉得很苦，想要回家，我劝了很久……

我送走最后一个兄弟的那天，特别失落，走出车站时和一个路人闲聊，这个人图鲁格乐队的主唱，我加入了这支乐队。这是一支以原创为主的本土乐队。我开始为乐队写词，吉他技巧也渐渐成熟。2004 年我们发行了专辑，作品很受欢迎！从那之后就有了很多机会参加大型演出或者上电视台节目。生活上倒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依旧穿梭在夜幕中，继续在酒吧演出。就在那时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就是我的妻子巴音。



第一眼见到她，我就认定她是我心里寻找的那个女孩。她善良、漂亮、大方、聪明，而且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刚大学毕业的她放弃了家里安排好的工作，加入了我们的乐队。有一次去西藏拉萨演出，我们深深爱上了那片纯净的高原蓝天。那里处处洒满信仰的阳光，纯朴的人们虔诚地磕着长头，每一幕都特别震撼。我们晚上在酒吧演出，白天和音乐制作人合作录制专辑。演出完之后，乐队的人准备回家，我和巴音却决定不走了。我们相依为伴，游走在西藏各地区，深入了解和钻研藏族音乐，还有幸结识了尼泊尔的两位音乐人，和他们在后藏日喀则合作演出了一段时间。那是一段很珍贵的时光，每一天都有感动。我们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日子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很快，3年就过去了。

后来，朋友叫我们来北京发展，我们俩很忐忑地来了帝都北京，不过心都还留在西藏呢！我们在一家藏族餐厅“玛吉阿米”演出，也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慢慢适应了这里的快节奏，学到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加入了玛尼石乐团，把对藏族音乐的理解融入乐队的创作当中，大胆地尝试了各种编曲。就这样，我们开始形成一种新风格，还录制了一张民间乐器弦子原声专辑，很受欢迎。我们乐队在2011年的中国藏歌会上夺得了冠军，2013年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巡演。巴音担任了大型藏族群星演唱的编曲制作人，也参加了选秀节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北漂的生活让我们对音乐的态度，乃至人生价值观都有所改变，也对做彼此的左膀右臂更加坚定。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是因为在经历，在成长，在进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更加成熟和坚定。

我和巴音是身为蒙古人，生长在新疆，行走在西藏的一对音乐伴侣，2013年，我们在故乡——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举办了近半个月的土尔扈特蒙古传统婚礼，回到北京后又是一家藏族餐厅举办了婚礼派对，9年的爱情长跑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音乐会陪伴我们一辈子幸福下去！

为后代留下自己的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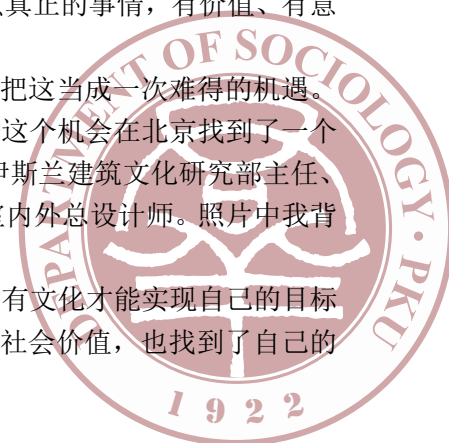
夏依东·买买提，42岁，维吾尔族

我是个建筑设计师，我做建筑设计是希望能后世留下自己的脚印。

我1996年从新疆艺术学院油画专业毕业之后，到了新疆木卡姆艺术团工作，1998年到上海进修了两年舞台美术。进修期间我接到很多设计的活儿，学也上了，钱也赚了不少，突然觉得，要是回到乌鲁木齐发展，不就赚大发了吗？朋友都劝我留在上海发展，我没听。我回到乌鲁木齐做建筑设计工作，没想过了10年也没什么发展，更没有机会，还把我在上海学到的东西荒废了。我觉得这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我想要学习，想要做点真正的事情，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2008年我被邀请去给舞台剧“五彩喀什葛尔”做舞台设计，我把这当成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付出了很多心血去完成，设计效果很棒，演出也非常成功，我也借这个机会在北京找到了一个工作平台。我现在是北京丽贝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伊斯兰建筑文化研究部主任、创意总监。之后的几年我担任了浙江义乌和海南三亚的大清真寺的室内外总设计师。照片中我背后的这座青海西宁南关清真寺就是我负责总设计的作品之一。

我对我两个孩子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学习，学习知识，学习技能，有文化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我来北京6年了，现在才觉得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也找到了自己的



发展空间。今年起我开始负责还原 13 世纪喀什噶尔古城原貌的设计项目，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把这个项目做好就是我现在新的目标和梦想。（截至出版，主人公已赴伦敦艺术大学留学、进修。）

追梦

阿迪力·卡尔（24 岁，维吾尔族）和伊力夏提·阿不都热习提（22 岁，维吾尔族）

我叫阿迪力，旁边这个戴帽子的“屌丝男”是我兄弟伊力夏提，我今年 24 岁，他 22 岁，我们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今年就要毕业了。我 2005 年第一次出喀什，出新疆，来到北京顺义杨镇一中上内高班。伊力夏提第一次出新疆是在 2006 年，他是我学弟。



我记得刚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和学校里的汉族同学打成一片了，我也想尝试了解北京人和新疆人有什么不同。但一些跟我一起来的新疆同学，他们以前跟汉族接触非常少，没什么了解，就

有些排斥，所以我在他们的心中就像个异类。我很努力地学习，想证明自己。在内高班上学的时候，我拍摄了一部专题片叫《杨镇一中我的家》，在 2007 年全国中小学生创新大赛上得了全国一等奖和创新大奖，北京市团体第三。我的家人、朋友乃至学校都以我为骄傲，那些曾经排斥我的同学也感到很自豪，这件事还让他们开始和本地的汉族同学有了交流。也是因为这部专题片，伊力夏提和我成了好兄弟，我们志同道合，都喜欢影像类的东西，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2009 年我考到了中国传媒大学，2010 年伊力夏提为了我们高中时的梦想，也考到了传媒大学。我为了跟他一起毕业，决定休学一年，家人还因为这个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那一年我到处找工作，学摄影。我曾经在摄影棚里连续待了几个月，也摆地摊卖过 T 恤和化妆品，还当过服务员。一年后我带着我的经历回到了学校，把我所看到的和学到的讲给伊力夏提听。

我们今年就要毕业了，和其他很多从新疆来内地求学的应届毕业生一样，都面临找工作的难题，不知道该留在北京还是回新疆。追问了一圈往届的师哥师姐毕业后的去向，大多数都回新疆了，但就业还是很困难，已经就业的几乎没有真正从事传媒行业的。这让我们俩觉得还是在北京这样多元化的城市里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但事实上并不顺利。北京竞争激烈，我曾经试着和其他新疆同学一起找公司实习，最让我尴尬的是，他们见到我们之后，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新疆人啊？新疆人不行。”可能出于种种原因，有些公司会抵触我们，于是我们尝试着用各种方式让别人了解我们，选择我们。条条大路通罗马，实现一个梦想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目前伊力夏提打算学习法语，以后去法国学习导演专业，留学回来后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我会留在北京，继续尝试找一份传媒类的工作，或者打工攒钱再深造。我们觉得追梦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截至出版，两位主人公都已经回到新疆，阿迪力在乌鲁木齐找了一些纪录片拍摄的临时工作做，伊力夏提回到了克拉玛依，因为家里要求必须是“铁饭碗”，他还没有找到工作，还在家等待。）



用音乐沟通

克尔曼·克尤木（39岁，维吾尔族）一家



我3个月大的时候就跟家人来北京了，在北京生活到1985年，全家迁回了乌鲁木齐，那年我10岁。之后父母在新疆大学工作，我的音乐生涯也是从新大开始的。

1992年，我跟在新大院子里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法茹克和艾尼一起，组建了一个摇滚乐队，起名为“傀儡”。新疆电视台国际部的一个栏目给我们乐队拍了一个MV，叫《精神贵族》，在电视台播出之后，我们乐队一夜成名。

1994年我考到新疆艺术学院音乐系学热瓦普等乐器，毕业后去新疆电视台工作。干了没几个月，我就辞了，还是想做音乐，就跑到北京来了，跟几个乐手组成“阿凡提”乐队，我做吉他手。我们在北京的几个餐厅演出，那时候新疆的歌舞演出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乐队当时还挺有名的。2000年我们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楼兰姑娘》。2001年，我们非常幸运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乐队火了。

“阿凡提”乐队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只是好景不长，种种原因之下，乐队解散了，这对我而言很遗憾。之后，我就面临着一个几乎所有音乐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继续在北京生存？生存问题解决了，你才能继续音乐事业。虽然当时“阿凡提”乐队很有名，但并不代表我克尔曼有名，谁知道你克尔曼是谁啊？我觉得我既然从新疆走出来了，就必须混出个名堂，不然绝不回头。

我决定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出专辑，这个过程艰辛又快乐。那是2002年，做唱片很花钱，租录音棚就很贵，而且我不希望只是随便录录，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为了找一个又好又省钱的录音棚，我找到朋友马小俊，他的录音棚就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很简陋，只有一台很老的台式电脑。棚还没装完，我们就拿折叠木板床做隔音，做出自然混响的效果。还有其他很多设备都是跟朋友借的或是便宜货。那个出租屋还经常停电，有时候录到特别好的solo（独奏）就停电了，也没法存下来。但我们心态很好，就这么反反复复两个多月，我的个人专辑终于完成了。我很感谢马小俊，后来我还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会帮我，他说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帮过他。

为了这张专辑，我花了不少积蓄，还要想办法把它卖给唱片公司，我跟家人亲戚也借了点钱。专辑都是维吾尔语歌曲，销路窄，因此我吃了许多闭门羹。我走遍了北京的唱片公司，最后朋友介绍我去天津泰达音像发行中心。公司代表大都对这张专辑没什么信心，可张总凭着我对音乐的理解，以及对未来事业方向的感觉，在唱片业因盗版和网络下载而不景气的环境下，还是发行了我的首张专辑，最终在新疆收获了两万张的销量——这在新疆已经非常好了。2005年，我和爱妻迪丽以夫妻组合的方式和张总签约，成为公司旗下的艺人。我现在是名歌手，也是个音乐制作人，在国内被称为“中国首席弗拉门戈吉他演奏家”，也是“吉他中国”网站的顾问。

音乐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沟通工具，人们可以通过音乐相互认识、学习、理解和包容。现在社会上对新疆人的误解让我觉得很尴尬，也很痛心。他们一看我们的长相就把我们当成老外，用英语问候，当我一说我是新疆人，那眼神和态度立马就不一样了，这样的情况在内地很常见，无奈地习惯了，但还是觉得不好受。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新疆和内地发生了好几起暴力恐怖事件，导致内地人对新疆人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加剧。作为新疆人，埋怨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相互交

流和理解，从我们个人做起，无论在哪个城市，在哪个岗位，一定要给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先从小事上体现出你的真诚和素养，周围的人才能通过你看到真正的新疆，真诚的新疆。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音乐来让更多的人消除误解，增进理解，让这个社会的环境更加和谐。女儿的出生是我在北京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事情，这也让我更加希望自己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信仰给我方向

张志强，35岁，汉族



张志强是我工作之后改的名字，我的原名是张兰疆，在家中排行老四，我的三个哥哥分别叫卫疆、建疆、志疆。

我父母的原籍是江苏徐州睢宁。父亲叫张明理，是一名教师，1964年他响应号召支边，来到新疆呼图壁县芳草湖军垦农场，这一来他就爱上了这片热土，三年后还把我母亲宋秀英也接来一起扎根在这儿。

芳草湖农场原是呼图壁县的一部分，农场场部驻地在清乾隆与嘉庆年间，由甘肃镇番县（现民勤县）移民在此垦殖建村，得名镇番户，此后多次更名。在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称为永丰乡，新中国成立后设立四区（辖渭户乡、正繁户乡、白蒿滩乡、大东沟乡）。1958年撤销四区，成立红旗公社。1959年将红旗公社西沟大队、白蒿滩大队、大东沟大队分别转建为卫星一、二、三场。1961年，在红旗公社基础上成立芳草湖总场，卫星一、二、三场改为一、二、三分场，将丹坂大队、正繁户大队、渭户大队转建为芳草湖总场四、五、六分场，隶属自治区农垦厅。1970年交昌吉回族自治州领导，1975年归属昌吉州农垦局管辖，1982年归属农六师。当然，这些历史我都是听我父亲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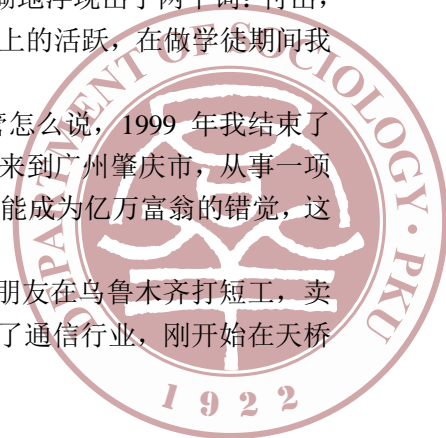
我父亲和我的养父就是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年代相识的，成了异族的好兄弟。我家兄弟多，父母工作又非常忙，很小的时候我就被寄养在父亲的这位维吾尔族好兄弟家里，之后又过继给了他，他成了我的养父。他叫吾不力·哈斯木，我养母叫尼莎汗。因此，我从小接触的就是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直到上学以后才回

到生父母身边。初中毕业之后，我决定不上高中了，想在社会实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当时身边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选择的。

1995年夏天，我跟着一个厨师来到呼图壁县的一家餐馆学厨艺，在那个年代做学徒非常辛苦，我甚至累到在切洋葱的时候都能睡着！也就是那时候我脑海里模糊地浮现出了两个词：付出，得到。也因为这两个词，我从没抱怨过。身体的疲倦并没有阻碍思想上的活跃，在做学徒期间我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的人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联系。

年轻时我们都爱做梦，有人说是理想，有人说是好高骛远。不管怎么说，1999年我结束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业——厨师，并怀揣着梦想坐上了南下的列车，来到广州肇庆市，从事一项人类历史上最疯狂的职业——传销。这个职业能让你产生一种明天就能成为亿万富翁的错觉，这种错觉的持续性和长久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好在我没有深陷于这样的错觉太久，2000年我就回到新疆，和朋友在乌鲁木齐打短工，卖水果，卖干货，只要能有钱挣，啥都干。后来我们赶上了潮流，选择了通信行业，刚开始在天桥



上摆地摊，在路边叫卖，从二手传呼机到二手手机都卖过。终于有一天，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家店面。看着收入的增加，我的野心在慢慢膨胀，决定去国外发展。2002年，我们几个朋友合伙在哈萨克斯坦开店，卖家电和通信产品，一直到2005年。这三年我赚取了我的第一桶金，当然这三年的艰辛和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我曾经被哈萨克斯坦警察以无证为理由关进国际监狱三次，平时做生意时被当地政府官员和警察敲诈也是家常便饭。

2005年我回国在各地考察了将近一年，最后决定去深圳做通信产品。正逢2006年到2008年底的黄金时代，我的事业蒸蒸日上。那段时间真的很容易挣钱，而且市场也很稳定，我感觉自己简直在飞翔。

飞得越高，摔得越狠。2009年的全球次贷危机以及之后的金融危机，都把我结结实实地甩在了水泥地上。那段时间我确实颓废到了极点，以为自己完了。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我早该读的书，也就是这本书让我的心中重新燃起了火苗，又有了动力，也让我在事业上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本书叫《古兰经》。

我是一个伊斯兰教信徒，早在养父母家生活的时候就有所接触，那段成长经历也成为我今天感悟的基础。我在哈萨克斯坦做生意时入了伊斯兰教，却没有好好看过《古兰经》。在宗教信仰方面我不狭隘，我尊重信仰，更尊重自由。宗教对我来说没有好坏之分，问题出在人本身。在我最失意的时候，我总会问我自己：“你到底是谁？以后的路你该怎么走？”这个时候就算是你最亲的人，也没法给你答案，能找出答案的地方就在你的信仰里，信仰会给你正确的方向。

现在我在深圳有了自己的房子，事业也很稳定，生活早已经融入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我热爱这座年轻、充满朝气而且包容的城市。我是新疆人，是汉族，也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都做礼拜，祈祷我的两对父母平安、健康和幸福，每年斋月也都会封斋。我今年的梦想就是找个穆斯林姑娘结婚。我热爱现在的生活，我想在这片土地上以一个新疆人、一个穆斯林的身份活着，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好好地活着！

用歌声缝合裂缝

洪启，41岁，维吾尔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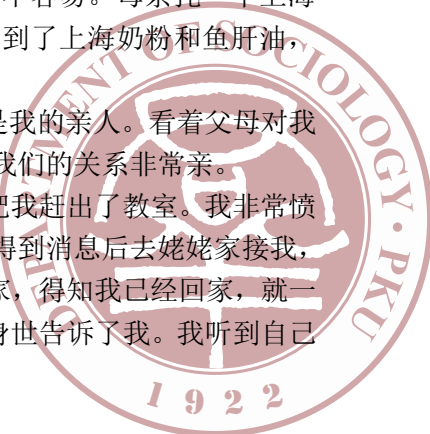


1973年，我出生在新疆和田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因为家里孩子多，没法养活我，生父便把刚出生的我交给了一对来自浙江淳安的支边汉族夫妇——洪文标和余佑春，我成了他们的儿子，名叫洪启。

我母亲是亲手把我从生母怀中接过来抱回家的。20世纪70年代什么都缺，要搞到奶粉很不容易。母亲托一个上海来的朋友，搞到了上海奶粉和鱼肝油，把我喂活了。

4年后，父母生下了弟弟洪雁。从小到大，我就一直认定他们就是我的亲人。看着父母对我的疼爱，弟弟倒觉得他自己像是被领养的。我从小就爱欺负弟弟，但我们的关系非常亲。

我小时候很固执，而且自尊心很强。有一次跟老师发生口角，她把我赶出了教室。我非常愤怒，也没跟家里人打招呼，就拿了一些钱，想坐火车去找姥姥。母亲得到消息后去姥姥家接我，我听说母亲要来，就坐上火车回去，跟母亲擦肩而过。母亲到了姥姥家，得知我已经回家，就一路哭了回来。一回到家，母亲就把知情的上海阿姨叫了过来，把我的身世告诉了我。我听到自己



的身世之后倒挺冷静的，因为小时候就总听别人说这说那，也早就察觉到了，但我在内心认定了这对疼爱我的人就是我父母。我也从来没有憎恨过抛弃我的生父母。

我也曾渴望见见自己的生父生母，但我觉得我现在很幸福，因为在我看来，我能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得到父母的疼爱，以及他们的宽容、理解，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生父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梦。

我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17岁就参军当兵了。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塔里木河的沿岸，主要任务是看守劳改农场。我是个不愿意受约束的人，到部队之后非常不习惯，感觉简直就是到了地狱。刚到部队3个月，我就试图逃跑，被抓回来了。我看着别人给家里人写信诉苦，要求调回去，我也给家人写信，但也没能成功。慢慢地，我习惯了这种生活，开始了解社会，明白面对社会的竞争，我根本不具备任何能力。部队成了我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每天看着和我成长的城市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我心里充满激情。在戈壁滩上行走时，在夜晚空无一人的岗楼上值班时，在烈日下的工地上干活时，我渐渐产生了唱歌的欲望，从最初的吟唱发展到尝试着创作歌曲。

从部队复员，我被分到兵团四建工会。第一次到办公室，看见办公室的人拿着报纸闲聊，我顿时觉得这份工作跟我完全没关系。我跟父亲借了300块钱，坐火车来到西安，从那时起便开始了漫长、艰辛，但又乐趣无穷的吟唱生活。苦是肯定苦，但我乐在其中。

我已经出了三张专辑，也做了些公益活动，比如“关注流浪儿童”的活动。世界是多元的，也是具体的，我不是同情维吾尔族人，我是同情我自己。我和绝大多数维吾尔族人一样，在社会上处于弱势，没有任何背景，没有特殊资源，但我见不得维汉之间的成见，容不得任何一方偏激。我想用歌声缝合世界的裂缝，这会是我将来重要的工作，哪怕作用微小。我最近为了在深圳做一个新疆主题的文化产业园，做一些文化交流活动，经常要在北京、新疆、上海、深圳四地跑，成了“空中飞人”。今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成。

“非典型”维吾尔人

阿克拜尔江·阿力坎，25岁，维吾尔族

我是一个“非典型”维吾尔人，一个电影工作者，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不太想戴着新疆人的帽子来讲我的故事。

对于我这种自以为很自由的人来说，过去其实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因为时代在改变，一切都在改变，尤其是我歪打正着，考到改变我一生的北京电影学院后，我原本简单的心也不得不随着环境而变。

跟其他来自新疆的同胞相比，我的人生经历不怎么富有戏剧性。就是因为喜欢文化艺术，喜欢演话剧，高考前以吊车尾的成绩，占了一个定向名额，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我的入学很顺利，这要感谢政策！入学后我对电影艺术从一点都不了解到极度热爱，自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我爱摄影，爱我的母校，更爱电影，所以从到北京开始，我一直都在为我心中的这份爱而努力坚持着，“虽有不易，青春仍在”。

我无法用文字尽述新疆的美，就算她一直承受着很多误解和压力。她的美不光是风景秀丽与瓜果飘香，还在于养育了一群最善良、最真诚，还有一点“小笨笨”的人。在这个正能量与矛盾



并行的时代，我希望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因为我相信，所有人内心那份最初的真善美会一直保存着，只要我们勇于展示它，相信世界会很美好。

回到正题，我是一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我不喜欢“朝九晚五”，不喜欢所谓的铁饭碗，因此抛下了在新疆的固定工作。我现在在北京从事电影摄影行业，跟所有背井离乡、渴望追寻自己梦想的人一样，我也希望在中国影视圈的中心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未来我希望能拍摄一部体现人与人之间真实感情的新疆题材的影片。这就是我，一个简单的、崇尚真理的新疆维吾尔族青年。

熬过叛逆就是梦想

阿尔斯兰·阿不都如素力，26岁，维吾尔族

我在广东佛山的一个足球俱乐部踢五人足球。刚签俱乐部的那段时间，我对佛山的天气和环境完全没办法适应，不习惯，还闹情绪，乱发脾气。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新疆那么久，那段时间里极度想家，有时候就装病不去训练，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幼稚。但我的教练都很理解我，说我只是想家了，会慢慢适应，还给了我回家比赛的机会。现在一年了，我已经完全适应了，也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也越来越好。为了梦想就应该坚持下去，我现在的目标是加入国家队。



我从小就踢球，上学前在院子里踢，上学了就进足球队踢。从初中到大学都是特招生，毕业后留在新疆做了体育老师，干了三年。

在父母眼里，踢球就不是个工作，放弃体育老师这样的铁饭碗，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可我就是想踢球。2013年7月，我来到佛山，因为听说这里有专业的足球俱乐部。

刚来的时候我想得特别简单，就是去俱乐部面试呗，可天上不会掉馅饼，我需要把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佛山的体育场都对民众开放，一到休息日比赛都排满了，一场足球比赛的场地费用才80块。不管什么时候，场边都有很多人观看，让我感觉这个城市的男女老少都很有体育精神。于是，我就去了佛山的各大球场寻找机会。

看到有足球比赛，我就去毛遂自荐，什么比赛都不拒绝，11人的也踢，5人的也踢。几次之后，我在业余界踢出了点儿名气，也多少能挣点儿钱养活自己了。“业余”了两个月，现在的俱乐部就给我打电话了。

签约后我经历了很多情绪波动，不想起床，不想去训练，后悔来这边。现在我没有这些情绪了，一说训练我都是第一个冲出去。现在我还经常和国外的俱乐部进行交流，这样的对比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真的觉得自己比起他们还差很多，还需要更加努力。现在，各个方面的磨合还在继续，心理作用非常重要，自我调节，减少压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在新疆，很多维吾尔族娃娃都有足球梦，就是没有机会，没有平台，即便来到内地，大部分也因为没法适应就走了，能留下的是少数。我现在也经常想念家人，想念新疆，最想念家里的饭。刚来的时候我不会做饭，佛山也没有新疆餐厅，就只能在兰州拉面店里凑合。后来自己慢慢学着做饭，第一次做米饭就做成了粥，第二次夹生，炒的菜也是难吃得自己都吃不下去，不过现在已经很熟练了，还会做拉条子，自己做的饭很香。



飞遍全中国

阿布莱提·买买提，43岁，维吾尔族



人生基本上只有两万多个日夜，我已经度过了快一半儿了，还能活多久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留下遗憾，只要我这辈子做成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哪怕是去摆地摊儿，我都会觉得此生无憾。所以我选择退伍去学飞行，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更希望让人们看到，我们维吾尔族人也有能做飞行员的。每当自己驾驶飞机翱翔在天空中时，我就能感觉到自己的梦想成真了。

小时候我本来想当个木匠，父亲觉得男孩子应该去学点手艺才有出路。长大之后我一直都是“被选择”的状态。从1985年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最后留在民族歌舞团，这一路我都没考过试，全是被选择——也许被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吧。在歌舞团的工资太低，没多久我就不干了，就考到了广东武警边防总队的歌舞团，这一待就是十几年，最后都到了一杠三星的时候，我自己主动选择了退伍复员。

我当时是广东武警边防有史以来第一个维吾尔族人。我来广州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觉得工资高。我父亲在1989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妈又是农民，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所以工资高点可以给家里分担一些压力。在军队的时候，我平时工作完成得都能让大家满意，领导对我也不错，生活也渐渐稳定了，完全可以就这样干到退休，没人想到我会选择辞职。不止一个人说我绝对是头脑发热，是“冲动性辞职”，但没人能劝得了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行动，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有一次和朋友去海边，看到有人在飞动力三角翼，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那个三角翼触动了我，也成了我辞职的动力。

之后的三年我做足了功课，研究好了去哪儿学，跟谁学，学完之后该怎么做，全盘计划好之后才辞的职。可能这件事一开始，梦想的感情色彩很浓厚，但在这三年我确定了所有细节之后，就已经是很理性的选择了。

复员之后的半年，我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去学飞行，回到广州后创办了飞行俱乐部，这也是广州第一家飞行俱乐部。从2005年成立到现在，我一刻都没有后悔过。

曾经有人直接当着我的面说：“你们维吾尔族人能干什么呢，顶多不就开个餐馆、卖个烤肉吗？”这句话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当时保持了沉默，但心里暗暗想着一定要做出一件大事，不仅能完成自己的梦想，还能为自己的民族正名。我是拿到了教练资格的高级飞行员，全国只有30多个滑翔运动的教练员，我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维吾尔族人。采访我的人很多，每当有人问我：“阿布，你是哪个国家的？”我都会自豪地大声说：“我是中国人，我是维吾尔族人，来自沙漠中的维吾尔族。”此外，我还会特地穿上民族服装接受采访。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证明，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身边的人改变想法，继而让更多的人改变对新疆和维吾尔族的错误看法。我从来都对我的民族无比骄傲，现在我又多了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就是培养学员。从零开始培养所带来的成就感，让我特别幸福。

我这40年做过演员，做过模特，做过编导，做过军人，现在又做了飞行员，跨度很大。我骨子里其实是个很感性的人。我想，如果是过于理性的人，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做出这么疯狂的选择。飞行带给我的感觉太不一样了，那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特别是在海上飞行，那种自由和



孤独的交叉感曾让我情不自禁地掉泪。这样让我狂爱的事情成了我的事业，这应该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吧。我不会停止折腾，我想飞遍全中国。现在我也正在为这个计划努力着。

新疆，我的第二故乡

孟晓程，56岁，汉族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今年我已经去了几次新疆，每次去都有人问我：新疆安全吗？我在那里生活了8年，北京到新疆的票根都攒了一抽屉。可是，那些突发的暴恐事件又让我很困惑。新疆，总是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

1991年，我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导演专业大专班毕业，我选择了新疆作为毕业作品的主题。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走进胡杨林。我和同学一起拍摄制作了专题片《未了情》，这部片子成了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机缘。之后的20年，我人生的关键词——胡杨、纪录片、流浪、爱情、亲情、友情、和田玉，都与此有关。



那时我在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电视台工作。为了采访在新疆工作的勘探队员，1995年我再一次去了新疆，一待就是三个月。1998年，我决定自费去新疆拍摄一部关于胡杨的纪录片，其间经历了无数波折和磨难，也有无数友情和关怀。然而待了整整一年后，我发现，新疆越来越陌生，这片神奇的土地不是短时间能够参透的。1999年，我移居库尔勒，成为一个新疆新移民。

到了库尔勒，我开始为塔里木油田电视台工作。我是个工作狂，拍摄的节目也频频获奖，塔里木电视台一跃成为中国石油系统百余家电视台中的佼佼者，我也获得了中国石油系统颁发的“铁人奖”。

司马义老人一家是我们最初选择的拍摄对象，后来，我叫他“达达（父亲）”，叫他的妻子“阿娜（母亲）”，她的小孙女是我的干女儿。每次去，我都有回家的感觉，吃着馕，喝着茶，盖着老爷子的羊皮盖睡在土炕上，心里非常宁静。塔里木河流域退耕还林，老人和他的村庄被移到了戈壁滩上，但胡杨林中原本属于他们的牧场被外来开发者开垦成了大片的棉田。老人在洪水季节自己灌溉的一小片土地也被人抢走了。5年前，老人在悲愤中离世。现在，胡杨林已经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了，由于大量开垦，连孔雀河边美丽的小城——库尔勒也开始被沙尘暴笼罩，也许离楼兰古国的命运已经不远。胡杨林的纪录片其实还没有拍完，只要是新疆的事，我都愿意倾尽微薄之力。

8年中，我多次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我最爱的第二个城市是和田。这是整个新疆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因此保留着更多历史和传统生活的痕迹。由于对和田玉的喜爱，我也更多地在那里停留。我还认识了维吾尔族青年库尔班江，他喜欢摄影，有着一般年轻人没有的理想和责任感。那时，他做和田玉生意，我是摄影师；今天，我做和田玉生意，他是摄影师。我始终记得自己当初进入新闻行业受到的最重要的教导：什么是价值？对社会有推动，对民生有关怀才是一部作品的价值。我非常高兴的是，他有这样的担当。

我的第一部作品中有一句对胡杨林的描述：那是少有的美，但却美得艰难。这句话吸引了——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姑娘，后来她剪掉长发，扔掉裙子和高跟鞋，和我一起走进胡杨林，一起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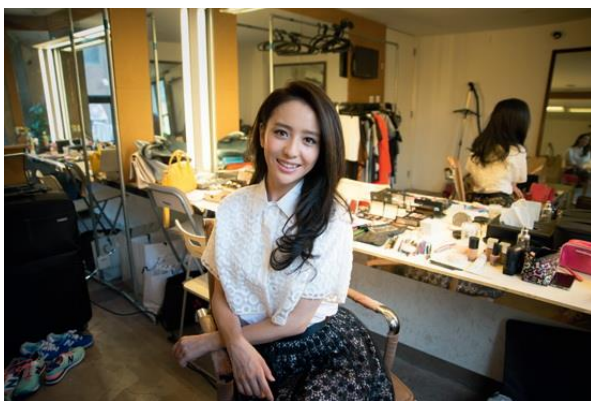
浪，直到今天和未来。我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自然类纪录片《森林之歌》的拍摄，这部片子获了国际奖，也对科学、社会和民生有益。

和田玉，在我看来是新疆无数珍宝中最宝贵的一种，我无数次把身上的所有都换成和田玉。晚上，被窝里、枕头边都放着玉，这也是一种奇怪的缘分。我知道，对和田玉来讲，我才是过客，但是，一旦拥有就足矣。买不起的，看过也算拥有。年过半百了，我要让老婆孩子不至于生活得太拮据，和田玉反过来又帮了我的忙。

现在，我在北京谋生活，每年都要回几次新疆。新疆永远是我的未了情，无论是记忆还是未来。我年轻时的梦想是开着吉普车，带着一条大狗，四海为家，去拍纪录片，那是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我还没有放弃，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北京梦想故事

佟丽娅，30岁，锡伯族



我出生在新疆伊宁，那里有30多个民族，被称作“塞外江南”。那里离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都很近，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很像。我从小睡在很高的钢丝床上，屋顶是尖的，家里特别爱用蕾丝的东西。小时候我吃着面包黄油长大，一放假就去农村的亲戚家，什么农活都会干，拿镰刀割麦子，掰苞米，熟练得很。在农村我住在哈萨克族的毡房里，老跟着伯伯们去原始森林骑马打猎。

我在伊犁市区里长大，家里有三四亩地，一个大院子，简直就是一个果园。我们还养了五六头马鹿，常喝鹿血酒，所以我从小就不怕冷。那时候大家离得特别近，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我们那儿把街叫巷子。一家做饭，整个巷子都能听见。新疆天黑得晚，夏天到晚上10点还亮着，我们就在外面疯玩，玩累了就住在朋友家，大人也不会担心小孩儿丢了，人和人之间特别亲近。

伊犁那边做的是边贸生意，有很多口里人（我们把嘉峪关以东的地方都叫“口里”）。我家院子就租给了很多外来人。当时住着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人，加上我妈妈是汉族，爸爸是锡伯族，所以我从小就在好几种语言的环境里长大。口里人讨生活特别不容易，我们经常串门，一起吃饭。

这些都是我记忆中的家乡，我眼里的新疆。受我以前演的角色的影响，大家都评价我为“温婉女神派”，但我是在新疆那样一个奔放而融合的环境里长大，性格其实一点都不文静。

1996年，我在新疆艺术学院附中舞蹈系学舞蹈表演专业，记得第一次来北京

是1999年国庆，我在花车上表演，阳光照在高楼的屋顶上，有绚烂的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玻璃房子，就觉得：哇，北京好美，连房子都是玻璃做的，还会发光。可能是从那时候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关于北京的种子。

2000年我考到了新疆艺术学院舞蹈教育专业，毕业后借调到了中国歌舞团。2003年，因为“非典”，大家纷纷逃出北京，我却为了跳舞而闯进京城。刚来的时候，团里没什么演出，兜里也没钱，我就去餐厅跳新疆舞，跳三四支舞就能挣200块钱。还有好几个维吾尔族姐妹陪伴，我觉得很开心，挺好。第二年，我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继续学习。



北京特别适合生活。中戏在南锣鼓巷，让我感到北京也不全是高楼大厦、车来人往，还总能听到胡同里响起的自行车铃，看到杨树下几个悠闲地摆开棋盘的大爷，还有街坊邻居聊着家长里短，那会儿就更觉得北京好，有人情味。

好多从新疆出来的人都会选择北京，可能其一是饮食能习惯，其二就是这种人情味。新疆人大多很仗义，而且是不需要“预热”，没有目的性的那种，当你是朋友了，有事就尽管招呼吧，绝对不藏着掖着，有多少力气全给你使出来。

毕业那会儿，说不焦虑都是假的，我在幸福大街边上租了个顶楼的房子，特别便宜，但不凉快。第一天晚上在那儿收拾行李，有火车轰隆隆过，整个空空的房子都像在摇晃，就感到心里特别落寞。新的篇章就要开始了，可能温饱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但我不是那种会闷在一个地方苦思冥想的人，要想打消对未来的焦虑感，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做些什么，比如说跑组。其实大家都会跑组、递资料，只不过我更有紧迫性。大学四年我跑了将近 100 个剧组，我对机会特别看重。哪怕我跑去的这个剧组肯定不会用我，我也会去，为了让对方对我有印象，也许以后就会帮到我。我好像从小就有这样的念头，想要抓住每次的机会。

新疆人其实心都挺大的。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实在不行就去餐厅跳新疆舞也行，怎么也能赚几百块钱，只要开心就好。后来考上中戏，学了表演，眼界开阔了，再回去跳舞是不干了，但我的心态还是一样乐观。事实证明，我大学四年跑的那些剧组都是值得的——那些导演都会记得我，后来也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一直有戏拍。

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觉得我吃了不少苦，但那些苦在我看来还很甜。比如当年还在中国歌舞团的时候，我跟着团里下部队慰问演出，到了晚上，一群姑娘夜卧草原，披星而眠，看着满天星星，环境是挺恶劣的，不过滋味很美。还有一次在拍戏的时候，我一不小心炸伤了右眼，都出血了，但简单地冲洗、消毒、止血后，我就继续拍戏了。现在想想还挺后怕的，但当时真没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吃不饱肚子才是真的苦呢。

一路我都是自己摸爬滚打过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怎么得到，然后就去争取，从小爸妈就教我四个字：不走捷径。还有一句话就是“腰杆儿硬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咱们新疆人就是这样，走到哪儿都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和能力，特别敢想敢干，什么都不怕。

我一直认为目标不能太长远。我现在想的就是下一部戏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下一次旅游要带我妈去哪儿，或者给我爸买个什么样的车，这样就足够了。

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世界

阿克拜尔·阿布都热衣木，40 岁，维吾尔族



我小时候性格特别外放、开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最爱看的书就是《十万个为什么》，我还给自己安排，每天要看一个“为什么”，梦想自己也能出这样一本书，能给别人展示一点什么。

我家小时候住在库车，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说她的朋友在少年宫教书法，问我要不要去学，我听完兴奋地两天睡不着。结果到了教室才发现是画画课，老师给了我笔和画板，还有两张纸，要我临摹摆在前面的一个

雕塑。我刚画完一张，就有个大人过去把雕塑换了个方向，我很纳闷，就又画了一张，结果刚画完，那个人过去又把雕塑换了个位置。我一个不高兴，就过去把雕塑搬回来了，我只记得我被骂



得很惨，扔了画笔就跑回家了。那天在上课的还有另一个邻居家的大哥，叫阿里浦江，是在阿克苏师范上学的学生，有的人说他有点儿疯，但我觉得他是个天才。他看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来跟我聊了很多，对我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自那以后，我对画画的兴趣越发浓厚。20世纪80年代初，经常会有内地的画家来新疆采风，阿里浦江认识不少。每次有朋友来，他弟弟就会过来找我，让我带着画过去。让我非常意外的是那些画家老师的反应，他们看到我的画都非常惊讶，看得出是因为我的画很好。

阿里浦江对我来讲是一位人生导师。他不光把我的画推荐给来新疆的画家老师们，还推荐给了在阿克苏艺术学院的蔡建兴教授。之后我报考阿克苏艺术学院，也是受到了阿里浦江的鼓励。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学院当时在全国都很有名气。我那个班三年才招10个学生，有3个从内地来的老师专门负责培养。我当时的文化课只是初中水平，上课考试都很困难，我之前上的还是维吾尔语学校，对汉语一窍不通。但这所学院看重的是艺术天赋和才能，所以录取了我。最后，我拿到了本科学位，那几年我在绘画方面的创造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毕业之后，我留校做了老师，学校希望我能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我18岁就开始工作了，我的学生里有3个是从内地来的，其中还有从上海来求学的。

上学的几年，加上刚开始工作的一年半，我的汉语有了一点进步，英语也学了点。1992年秋天，我第一次离开新疆，为了完成到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心愿。那时我才知道自己的见识太少了，因为我都不知道研究生考试是用汉语考，而且还要考英语！

我拜访了蔡建兴教授，他正好在中央美院。他带我转转北京，还带我在中央美院画画，画的作品被学院的老师看上了，让我去进修。我是梦想着来北京上学的人啊！我并不只满足于进修，所以第二年我就考到了中央美院，但上了三个月我就退学了，因为美院的教授建议我自己画，因为我在绘画上已经很成熟了。我和英国的一个画廊签约，看着作品一幅幅被卖出，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激励，因为作品有销路，才代表着被认可。几年后，我在国外也有了一定的名气，到了2000年，在国外的艺术杂志里也有我的作品了。

我只在上学的时候为钱愁过，多年以后靠自己的能力，我已经不需要再为钱担心了，一度感觉好像画什么都能卖钱。但对我来说，经济上的满足只是一个层面，精神上的满足更为重要。和我小时候奔放的性格相反，现在我完全变成了一个安静的、不善言辞的人，因为我找到了可以把愿望和想法表达出来的方式，那就是油画。

“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艺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是文化”，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我以艺术家的眼光看社会，更希望世界充满阳光，国家和平富强！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去国外生活，我说：“因为我的伯乐，我的恩人，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的事业，都在北京。”在北京我们可以不分国籍和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尊敬，过着和睦、幸福的日子。是北京给了我事业，让我的艺术走向世界；是北京让我此生足矣。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无论你是否才华横溢，只要把自己放对了位置，就能有正念正见和正语正行。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

我现在在北京壹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壹瓶画院的院长。这些年我的事业算是成功了，但归根到底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我希望通过艺术去感动别人，因为艺术是一个高尚的东西，更是一份高贵的事业。我希望继续这样低调简单的生活，希望下一代的成长环境更好。我到现在也没买车，我热爱大自然，不想只是嘴上说说，为了能感染更多的人去保护大自然，我先从我自己做起。我的梦想是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推动发展一个艺术院校，给下一代创造和平、绿色、美好的生活环境。



从没去过新疆的手鼓王

谢胜利（69岁，汉族）和乐队队员



我已经快 70 岁了，从没去过新疆，但是我有一个维吾尔族老师，他是新疆手鼓王，他叫阿不力孜·阿合其。

1945 年抗战胜利，我在那年出生在刘邓大军的根据地，父母都是抗日干部，给我取名为“胜利”。我 15 岁加入天津歌舞剧院少年训练队学打击乐，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新疆手鼓。因为一次偶然的机，我看了当时在东方歌舞团的阿不力孜老师来天津的演出，很激动，就很冒昧地去拜师了，没想到老师很痛快

地就收我做徒弟了，我是老师唯一的汉族徒弟。

没多久我参军去了北京，更方便跟老师学习了，老师也对我这个汉族学生特别好，经常请我去他家吃饭，每次去师娘都会给我做抓饭。我很刻苦，老师也说我进步很快，毕竟新疆手鼓的鼓点依靠的是少数民族血液里的音乐天分，但我都练出来了，特别是塔吉克的鼓点，我学得很出色。阿不力孜老师是民间艺人出身，从不写谱子，全是口传心授。他汉语讲得不好，我就慢慢听，还学会了老师用维吾尔语念鼓点的方式，这个是别人都听不懂的，我却能听懂。我敢说，汉族人里能用维吾尔语念鼓点的就只有我了。跟老师学习让我长了很多知识，也使我更加热爱新疆音乐。

我 1996 年退休，次年就到了深圳。之后不久，总政歌舞团的克里木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阿不力孜老师走了，我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汉族学生。我非常非常难过，当即回到北京为老师送行，并把家里的手鼓带到了深圳。一直到今天，我每天都一定会保证三个小时的手鼓练习，只为了纪念阿不力孜老师。

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不分民族、不分国界的，它是人类共享的财富。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就是认识了阿不力孜老师。每当我拿起手鼓，就想起老师；打起手鼓，就是为了纪念他，我希望能传承他的音乐和精神。很多人都说我快 70 岁，该享受生活了，但我觉得打鼓对我来说就是享受。

2012 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认识了三个维吾尔族小伙子，他们的乐队在找鼓手。小伙子们看我打鼓打得特别好，于是我作为一个大龄汉族人，就这么成了他们乐队的一员。我们的合作非常有默契，我觉得这就是天意和缘分。

阿不力孜老师曾经和中国台湾某乐团录制过一张专辑，其中有一个手鼓独奏。我要到了总谱，想学下来，更想找大乐团来合作这首曲子，传承老师的音乐。我现在每天都在不停地练习，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实现这个梦想。

真主会眷顾努力奔跑的孩子

麦迪娜·买买提，27 岁，维吾尔族

三年前父亲住院的时候我们聊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父亲当时觉察到了什么。他希望我不要做一个弱女子，而要做一个女强人，不要靠男人。他说：“你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假如以后我们不在，就没有人可以给你做主了，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地位。当你被欺负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该去哪儿的时候，如果有自己的地位，就不会受伤害。”那次聊天对我的影响特别深，父亲是家里唯一理解我的人，我来北京拍戏也是因为父亲的支持。他劝说我母亲让我去，让我按



照自己的意愿活。我演的电视剧父亲每天都看，我上的节目他也一直在关注。就是这样一直在支持我的父亲，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去世了。



一开始听说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马上就回乌鲁木齐了，陪了他一个月，推掉了所有的工作，每天给父亲刮胡子、洗脚。后来他好多了，天天催我走——公司一直打电话给我，父亲都听到了。12 月 2 日我被父亲劝走了，当时觉得他已经好转了。9 号那天还和父亲在电话里聊了好久，挂了电话，就过了一个小时，我心里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然后我姐姐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早上回去……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 9 点了，我订不到当天的票，买了第二天一早的。大冬天，我坐在地铁站口就哭了。第二天辗转 10 个小时，我还是没能看到父亲最后一眼。妈妈说父亲一直在为我祈祷，不想让我看到他去世的样子，怕我看了一辈子都会很痛苦。到现在我都很自责，如果当初自己能陪着他就好了。

大家认识我应该是通过《还珠格格》里香妃那个角色。我在拍那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能接到这个角色，我觉得都是真主安排的。那时我还在新疆歌舞团，队长突然打电话说有人要来参观，我和好朋友连忙赶回去表演。第二天上班路上我就接到电话，说要去试戏，我还以为是骗人的，就把电话号码给了姐夫，让他帮我确认一下。后来姐夫跟我一起去北京，做我的临时翻译。再后来，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选上了。我真的觉得这是真主的安排，是真主给了我一个机会。

我 10 岁就开始学跳舞，第一次来内地是在 1998 年，当时是作为新疆歌舞团委培的学生，到北京舞蹈学院上了四年学。2002 年 3 月，有很多团的团长来选人，我和另外三个人就被中国歌剧舞剧院选中了，在那里待了一年半。我们每天都泡在练功房，工资有 2000 多块，日子过得特别开心。后来因为“非典”，妈妈很担心，劝我回去，我就离开了单位。

回来之后被选去了歌舞团，但头两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只有演出费，每场 50 块钱。我和几个同学就去跑场跳舞，能多赚一点钱。和中国歌剧舞剧院相比，落差很大，我甚至不想干了，但因为在北京花了家里很多钱，就咬牙坚持了下来。之后，我就等来了演《还珠格格》的机会。

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我家 5 个孩子，但到现在我哥哥都不支持我拍戏，也不怎么联系我了。他在巴楚县，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我就打电话给我妈，问我在干什么，怎么还不回来。而且我妈妈家的亲戚都是 Hajim（去麦加朝觐过的人），他们也都不喜欢我，父亲这边的亲友也一样。包括妈妈，其实到现在她都不理解我的工作。母亲快 40 岁才有了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我每个月都会给母亲寄钱，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是我现在最快乐的事情。

我每天 5 点就起床拍戏，拍到很晚，连洗脸都是用最后一点力气，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继续工作。赚钱真的不容易。而且有一些汉语我不理解，特别是古装戏里的台词，为了不被嘲笑，我就努力地背下来。拍古装戏的时候，服装都特别厚，有时候赶上天气热，真的会很崩溃。但是为了梦想，我一定会克服这些困难。

来拍《还珠格格》的时候，我就明白什么叫“为梦想而工作”了。以前想法特别简单——上班挣工资，然后结婚，就行了，没什么梦想。现在拍戏接触了很多工作人员，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弯腰帮我穿鞋就觉得难为情，反而是我特别不好意思，他们还说：“你别动就行，这是我的工作，你配合我就好。”



真主会眷顾那些努力奔跑的孩子，就在家里待着是没用的，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话：付出的汗水一定会有收获。每次早上起不来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要忍耐一下，我吃了这些苦，真主会保佑我以后吃上饭。我们公司的人说我是傻人有傻福，我觉得这样也好，“傻傻更年轻”。

我特别高兴自己能选择离开一个不适合我的环境，我要感谢父亲的支持，也要感谢真主的安排。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会更好。

百年上海五代维吾尔人



索拉亚·阿尔克（34岁，维吾尔族）一家



20世纪40年代，索拉亚·阿尔克妈妈家的全家福，新疆伊犁



20世纪50年代，索拉亚·阿尔克爸爸家的全家福，上海



太爷爷是 1920 年来上海做生意的新疆人，他们从新疆去上海花了一个多月，先骑骆驼途经乌鲁木齐到兰州，再从兰州坐汽车到南京，最后从南京坐船和火车到上海。

太爷爷和太姥爷都是在伊犁做生意的人，在当地很有权势，也很有影响。太姥爷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注重教育，他在林则徐的下一代手里工作过，虽然不会说汉语，但是听得懂，还会算术，做生意很成功，还资助了伊犁二中的创建。家里的几个女儿也都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爷爷迎娶奶奶的时候，婚礼办了 40 多天，那是 1944 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爷爷也去上海做生意了。1951 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形势发生了变化，1953 年爷爷就带着全家人到上海定居了。奶奶在老家伊犁就受过教育，汉语很好，来了上海还在街道居委会做老师，帮着教人普通话，做过扫盲的工作。1956 年父亲在上海出生，是早产儿，幸亏上海当时的医疗水平高，才活了下来，要在新疆可能就没救了。

那时候，来上海做生意的维吾尔族有两三百户，1956 年上海搞公私合营后，有的去了广州，有的被抓了，还有的去了国外。爷爷走了公私合营这条路，把所有资产捐给了国家，交给了现在的第六百货商店，然后留在那里工作，就这样一直到去世。

父亲和母亲结婚前只回过新疆两次。爷爷在家都逼着孩子们必须说维吾尔语，但毕竟上海没有那个环境，父亲说他小时候根本不懂家里来客人时，男孩子要和父亲一起出来迎接。爷爷担心父亲忘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及生活习惯，就带他回了趟新疆，去伊犁走亲戚。父亲就是在走亲戚的时候认识了母亲，他俩还是表兄妹，但还是一见钟情，当时就在伊犁把婚结了，母亲随后跟着父亲到了上海。

母亲家一直走的是“革命之路”。姥爷上过伊斯兰教学校和普通的学校，去苏联读过书，是参加过三区革命的民族兵，后来还去沈阳交通大学进行过培训。他坚持让家里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母亲小时候上的是维吾尔语学校，但汉语很不错。

母亲说这辈子就被父亲骗过一次，就是在结婚的时候。父亲当时说他在上海的家非常大，厕所都有抽水马桶，等来了上海之后母亲才发现，家只是个 6 平方米的房子。母亲问父亲：“你那个抽水马桶呢？”父亲打哈哈说慢慢就有了。后来有了我，有了弟弟，房子也从 6 平方米到 15 平方米再到 90 多平方米，现在还有了更大的房子，果然慢慢什么都有了。父母说，这都是孩子带来的福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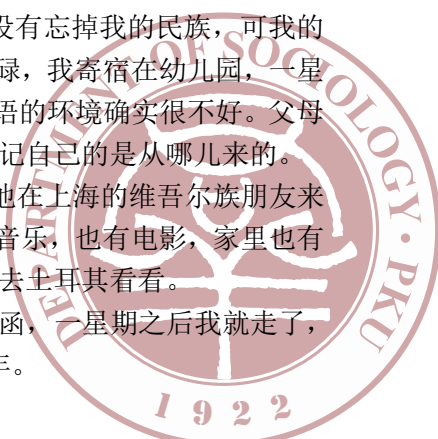
母亲刚来上海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上海话一句都听不懂，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刚度”，后来才知道是“笨蛋”的意思。因为不习惯，来上海半年后母亲就哭着要回新疆。后来在上海工作之后，特别是有孩子之后，母亲也就渐渐什么都适应了。母亲不后悔来上海，但唯一的遗憾是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在新疆的所有亲友都分开了，姥爷去世时也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很多亲戚家里的婚礼都去不了。父母都说，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把一对子女在上海养育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是上海人，维吾尔族

很多在新疆出生长大的人说“我是新疆人”，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我说我是“上海人，维吾尔族”，很多人就会反驳我：“你明明是个新疆人。”我不明白，我并没有忘掉我的民族，可我的确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碌，我寄宿在幼儿园，一星期只能见父母一次，再加上爷爷奶奶去世得早，所以对我来说维吾尔语的环境确实很不好。父母能做的就是把我定期送回新疆，和家族的亲戚们多相处，让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是从哪儿来的。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阳台足足有 30 平方米大，父母经常会邀请其他在上海的维吾尔族朋友来家里聚会。那时候母亲很喜欢放从东欧和土耳其带回来的录像带，有音乐，也有电影，家里也有很多土耳其的杂志。我小时候就被土耳其文化影响了，梦想着一定要去土耳其看看。

我和土耳其也确实有缘分——毕业后我收到了来自土耳其的邀请函，一星期之后我就走了，那是 2001 年 9 月。原本计划就待两年学语言，没想到一下子待了 8 年。



刚到土耳其，身上只有父亲给的两千美金，连学费带生活费都在里面，这是爸爸一贯的培养方式——必须自己想办法挣钱。有阵子我甚至穷到去自习室收不用的书卖给二手书店换钱。毕业的时候，我找了一些教中文的工作。我在国内学的就是学前教育，从小就喜欢当老师，也喜欢孩子。渐渐地，我从大学中文老师做到私立学校的汉语组组长，也教出了自己的风格，有了自己小小的名气，后来还去了当地的中土文化中心，负责汉语教学工作。这段教学经历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一段回忆，也是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幸福。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使自己得到升华，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怎么样能做得更棒，这让我非常开心。

一开始，我土耳其语说得并不好，而且因为我的维吾尔语也不好，所以受到了一些和我一样从国内来留学的维吾尔族同胞的嘲笑，让我自尊心很受挫。于是，我尽量避免和他们过多地沟通，转而多与土耳其本地的朋友聊天。我会观察他们说话的感觉和方式，努力学会用最简短的句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也是之后我在从事教学时和学生强调的一点：不要在乎语法，不用担心标不标准，时间长了，说得多了，就标准了，要大胆地多说多练。

维吾尔族学生学土耳其语很快，这确实让人很羡慕，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学了三个月之后，觉得学会了，就去当翻译挣钱了，这导致他们土耳其语的基础不扎实，说出来的是两种语言的混合体，写作能力也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我开创了“亚亚学土语”，用我自己的经验和方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土耳其语，真正会说土耳其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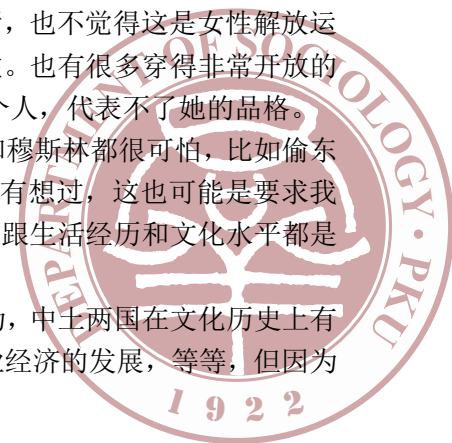
在土耳其的 8 年让我不光了解了当地的人文生活，也深刻了解了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虽然家里有父母提供的文化和语言氛围，但只是把很多传统习惯和信仰活动当成一个动作，而在土耳其生活的过程中，我才明白了很多深层的含义。有这么多年的了解的基础，我看待土耳其这个国家就非常客观。

在土耳其，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维吾尔族。土耳其人自认是突厥民族老大哥的心态，让我特别不舒服，每次有土耳其朋友说类似挑衅的话，我都会反驳说：你要叫我奶奶，因为你是从我们这边过去的。我还会告诉我的土耳其朋友，土耳其经历过许多文化的冲击和洗礼，成为一个非常有历史、有故事的国家，但这里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和我觉得土耳其非常好，想去那边留学，我就会给他讲土耳其不好的一面；有人和我说土耳其不好，我就跟他讲好的一面。这并不是要打击对方，而是希望人们能对这个国家，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要盲目跟风。土耳其是一个很适合待上半年，学习语言，玩一玩放松一下的地方。

爸爸妈妈通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影响着我们对信仰的看法。爸爸虽然在上海长大，但还是很努力地向我们传达伊斯兰教文化，他在清真寺学过阿拉伯语，现在也会做礼拜。小时候我并不懂什么是信仰，直到在土耳其生活之后，很多事情才有了答案。正因如此，我对新疆的变化才会很惊讶。我从不觉得包头巾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有一次回新疆，看到突然多了很多包头巾的姑娘，就问亲戚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有谣传如果不带头巾就会怎样怎样。我在土耳其有包头巾的朋友，也有不包头巾的朋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有过不理解或者歧视。土耳其有很多包头巾的姑娘穿得非常时尚，看过之后我自己都非常想尝试。我并不觉得这是落后，也不觉得这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障碍，那只是个头巾，用来遮住头发和耳朵，但没有把智慧遮住。也有很多穿得非常开放的人但脑袋空空，穿得很保守的人却在做坏事，一个头巾代表不了这个人，代表不了她的品格。

在上海也会遇到很多对穆斯林有偏见的人，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都很可怕，比如偷东西要砍手。我总会说：《古兰经》在字面上确实是这么说的，但有没有想过，这也可能是要求我们砍掉心里的魔手呢？同样一句话，每个人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这跟生活经历和文化水平都是有关系的。

我现在在做关于中国和土耳其旅游文化交流的工作。我一直认为，中土两国在文化历史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繁荣到落败，从经历的变革、文化理念到商业经济的发展，等等，但因为



两国互相了解得太少，大家彼此很陌生。我希望通过一些旅游和文化方面的活动，使两国能产生更多的交流和沟通。

我已经结婚了，女儿也一岁多了，她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第三代维吾尔族。为了让女儿有一个比我更好的语言环境，母亲在家和女儿只说维吾尔语，我就用土耳其语。等她再大一点的时候，我打算找一个维吾尔语老师专门教女儿，这就是我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方式。我是中国的维吾尔族，也是上海人，这是我最好的自我介绍方式。

本科先生和博士太太的幸福生活

艾力江·依布拉音（27岁，维吾尔族）、玛依拉·艾则孜（30岁，维吾尔族）夫妇



艾力江·依布拉音：为家乡设计公路

好多人问我：娶个博士做太太，没有压力吗？我没觉得有压力。媳妇虽然是博士，但特别会持家，我们俩是为了美好的梦想和家庭一起奋斗的一对。

我是新疆库车人，父母是中学老师。2005年我第一次离开新疆，去江西南昌市读了两年预科，2007年到南京东南大学读本科。大四时找工作，被拒聘本来是挺正常的事，但有一次我被家乡的设计院拒绝，心里特别难受，感觉四年重点大学都白念了。我没放弃，继续跑招聘会，积极参加面试，终于被现在这家被评为“中国勘察设计单位综合实力百强”的单位——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聘用了。

工作这几年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们单位有2000多名职工，我是唯一的维吾尔族人。有一次出差去和田，我每天都要去野外勘察，做设计，还要当翻译，听当地有关部门和老百姓的需求。工作了半个月，古尔邦节到了，我不想影响团队工作的进度，就要求继续工作，但领导硬让我回家过节，于是我当天就回库车跟家人团聚了。这样人性化的管理让我特别放心，而且很温暖。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是什么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力，只要有能力就会有价值。我的户口也已经落到西安了，除了护照跑了好几趟还办不下来之外，生活还是很如意的。

其实毕业的时候，我是一个想要回新疆建设家乡的热血青年，我想为家乡设计公路。虽然最后没能在家乡找到用武之地，但是我在现在的单位有机会参与新疆的公路建设，我能很自豪地指着新疆的一条公路说：“这是我参与设计的。”

记得第一次来西安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想找家乡菜还挺困难。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个在长安大学读博士的维吾尔族姑娘，让她带着我熟悉一下西安。这位女博士非常忙，好几次才终于约上她吃了顿饭。我想着，干脆把这位博士娶回家，组建家庭，一起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只用了5个月。

现在我们在西安的日子过得很丰富，我白天在单位设计全国各地及国外的高速公路，晚上回家陪老婆，自己看看专业书，两个人一起探讨人生。周末放假和朋友们去郊外旅游，或者去打球，假期长的话就回新疆陪陪父母。现在媳妇怀孕6个月了，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幸福。我偶尔会想，如果当时自己被新疆的设计院聘用了，会不会有现在这么幸福呢……

玛依拉·艾则孜：博士不常有，伯乐却常有

我从本科一路考到博士，发自内心地觉得我们少数民族从新疆出来后，遇到的困难不少。语言是可以学的，但饮食和生活习惯是最大的困难。十年的学习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的老



师、同学，还有朋友们对我的理解、宽容、尊重和照顾，让我这一路走来都一直很有信心。只要肯努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新中国成立前，爷爷就是当地很有名的知识分子。爸爸是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家里四个孩子也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生。

因为从小上的是民族语学校，2001 年去宁夏的北方民族大学上预科之前，我几乎不会说汉语。预科那两年很苦，我就把学习当成缓解痛苦的方法。两年后我就能听懂汉语了，而且可以用汉语和同学老师沟通了。

2003 年 9 月我在长安大学开始本科学习。因为两年预科只学了汉语，没学其他课程，所以上专业课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上课经常听不懂，信心很受打击，几乎不想上课了。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影响我学习生涯的人，他叫徐家宽，新疆塔城人，在我们学校工部上班。他就像我的爸爸一样，一直用自身的经历鼓励、支持我，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勇敢地面对学习上的困难。

大学四年我的成绩在班里都是前十名，在民族生里是第一，老师鼓励我考研，正好那个时候有“少数民族骨干人才计划”，可以免学费。我顺利地考上了。少数民族考研究生在我们学校很稀罕，有史以来就两个，我成了第三个，而且是第一个女生。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回新疆当老师，另一个就是考博士。我想了想，自己还是想继续研究这个专业，就这么一路成了女博士。

读硕士的时候，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新疆一个民族企业的几位高管，他们觉得我是个“女汉子”，希望我能去帮忙。我觉得这是个锻炼的机会，就担任了生产和采购经理的职务。工作开始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但企业的总经理阿卜杜拉鼓励我坚持下去。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工作能力特别强，和他一起工作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2009 年我刚来的时候，这家企业规模还很小，品牌也不大，但发展非常快，2011 年的时候已经是民族品牌里数一数二的了。我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考上博士之后，我还在那儿继续工作了两年。

2012 年 12 月，我认识了在西安上班的一个老乡，他说他刚来西安，对这里还不熟悉，希望我能带他吃个饭，熟悉一下。没想到熟悉了西安之后，我们俩也“熟悉”上了。我觉得他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人，相识 5 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婚后半年我怀了宝宝，身体不允许我兼顾家庭、学业和工作。工作上我已经非常熟悉了，只有辛苦，没有难度，但专业上对我来说需要探索的还有很多。和丈夫商量之后，我做了辞职的决定，回到了学业上。

回头想想这十年，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习过程对我来说非常辛苦，但我都走过来了，现在也有了幸福的家庭和支持我的爱人，这都是我更加努力的动力。我现在到了学业最关键的时刻，希望在宝宝出生前我能结束手上的科研项目，顺利毕业。（截至本书出版，艾力江·依布拉音和玛依拉·艾则孜夫妇的孩子已经出生，是个早产儿，身体很健康，取名为佳苏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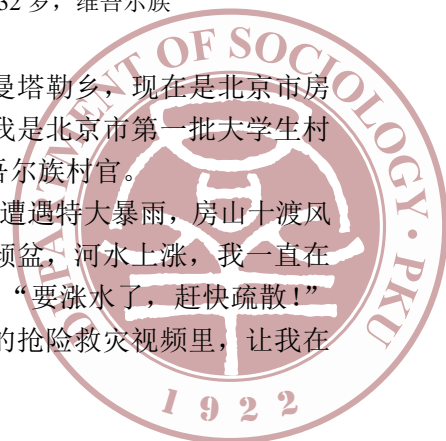


北京房山的维吾尔族村官

艾山江·买买提，32 岁，维吾尔族

我来自新疆麦盖提县吐曼塔勒乡，现在是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项目办副主任。我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之一，也是唯一的一名维吾尔族村官。

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房山十渡风景区就是重灾区。当时暴雨倾盆，河水上涨，我一直在救助伤员，疏散群众，高喊：“要涨水了，赶快疏散！”这个画面被拍进了央视播出的抢险救灾视频里，让我在



老家和北京都出了名。

我是当时我们县里为数不多的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族学生，这源于我父亲的决定。那时候，送孩子去学汉语在县里是挺少见的，父亲也拿不定主意，就去问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他说：“只要是学习科学知识就可以，语言也是知识。有时候一门语言能救人，这也是一种功德。”

我在学校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有次家里来客人，长辈们聊到了新疆一个很有名的师范学校，父亲开玩笑地跟我说：“你要是长大了能考上这所学校，我就把帽子扔到天上去！”我们维吾尔族男人不轻易脱帽子，更不会扔帽子，我父亲这么说是觉得我考大学比登天还难。我特别不服气，说：“我将来不光要考上这所学校，还要考北京的大学！”2002年，我考上中国地质大学，但父亲已经去世6年了。可以说，考上的喜悦挡不住父亲无法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哀伤。

父亲去世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母亲想让我退学，但老师都认为我一定会出有出息，应该继续上学，还免去了我所有的学费。后来我在地质大学四年的学费也都来自新疆的西部助学资金。

没来北京的时候很向往，来了之后又很孤独，因为在老家到处都是熟人，到了北京周围都是陌生人。渐渐地，大学四年里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毕业的时候面临就业选择，刚出校门的我跟很多应届生一样，眼高手低，觉得自己能力很强，什么都能做，在求职过程中碰了不少壁。身边的老乡都选择回新疆工作，但我想试试自己的能力，无意中看到北京市首次选聘大学生村官的消息。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可以到农村进行人生历练，就报名了，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我们学校有400多名毕业生报了名，最后只招收了40人，我入围了。全北京招了2000名大学生村官，我是唯一的维吾尔族人。

一转眼，工作8年了。从最开始的村委会主任助理，到现在的项目办副主任；从为村民修水表、修电表、填表等各种琐碎小事，到现在为整个镇子的投资项目奔波；从教村民讲维吾尔族的语言，到教会他们穆斯林的饮食习惯，再到我从村民那里了解汉族的文化传统，并学会尊重……最令我欣慰的就是村民都说我是他们离不开的人，我现在也会说我是十渡人。我一直觉得把事干好，把活干出来，就可以了。

生活上嘛，年龄也到了，早该结婚了，在北京找个维吾尔族姑娘可不容易——“资源”太少。很幸运，我找到了，今年准备和女朋友结婚。我也想就这样在北京扎根。（截至出版前，主人公已和女友喜结连理，并在老家举办了婚礼。）

梦想是动力

艾娜，33岁，蒙古族



我来自盛产香梨的库尔勒，是1771年东归的土尔扈特部族的后代，现在在北京一家上市公司负责培训工作。我来北京11年了，身边很多朋友因为我而了解了新疆，知道新疆也有蒙古族，他们还喜欢上了奶疙瘩和奶茶，我很开心小小的自己能发挥这样一点作用。从小到大我的目标就是让老妈过上不操心 and 舒适的生活，我在学校好好学习，毕业后留在北京努力地生活、工作、挣钱，现在不仅自己独立，也能让老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感到很高兴。我的工作在去年有了新的起色，另外我希望今年感情生活能圆满，最后还想和老乡们搞搞蒙古文化方面的小社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文化。我一直都觉得古丝绸之路很有魅力，今年还想去哈萨克斯坦看看东干族的老乡们。梦想很多，这也是我不断努力和进步的动力。

